

国内外反贫困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牛 奔, 陆 倩, 宗雪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反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一个难题。借助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以中国知网和科技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中近 21 年收录的 4 763 篇有关反贫困的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 从时间分布、高产出研究学者和学术机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对比。研究发现, 国内反贫困研究文献较国外少, 并且国内学者之间的认可度较低、研究机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 在研究热点方面, 中文研究者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法, 以某一贫困地区为调查研究对象, 针对性探讨其反贫困举措, 较少探索普适性理论, 外文研究者更加偏重以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反贫困措施, 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研究趋势方面, 中文文献多以政策为导向, 外文文献更偏向理论产出为导向。

关键词:反贫困; CiteSpace; 可视化; 研究热点; 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F323; G35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3)22-0209-12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 虽然我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产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冲突, 加之新冠疫情冲击, 使反贫困的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反贫困问题一直受到我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内外反贫困研究文献成果的系统梳理, 不仅有助于我国在新时期的反贫困治理问题上寻求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而且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取中国知网中的“北大核心”数据库和科技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中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 21 年的相关文献为文献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 从发文趋势、作者分析、科研合作、研究热点等方面, 对国内与国外的反贫困研究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直观反映反贫困

研究内容, 从而推断反贫困研究热点及前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针对国内外反贫困研究可视化分析, 表 1 从数据库来源、检索方式、文献类别、识别跨度、检索结果以及检索时间等六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

表 1 研究数据的来源

研究范围	国内	国外
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数据库	WOS 中的 SCI 数据库
检索方式	关键词 = “反贫困”或“贫困”或“扶贫”	关键词 = “anti-poverty”或“aid-the-poor”或“poverty reduction”或“support poverty”或“poverty alleviation”或“poverty eradication”
文献类别	期刊论文	Article
识别跨度	2000—2021 年	2000—2021 年
检索结果	2 144 篇	2 789 篇
检索时间	2022 年 5 月 9 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1.2 分析方法和工具

CiteSpace 是基于 Java 平台开发的一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知识图谱绘制方法, 可以直观地识别学科前沿的演进路径及学科领域的经典基础文献, 并

收稿日期: 2023-08-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CMZ030);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YCSW2022265)。

作者简介:牛奔(1998—), 男, 安徽亳州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通信作者陆倩(1989—), 女, 湖北荆门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宗雪琳(1998—), 女, 安徽合肥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用来探测和分析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态,是信息可视化常用的分析工具^[2]。最近这些年,以 CiteSpace 为工具,在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WOS 等数据库的支持下对某些学科或某些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对搜索到的中外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从文献作者、发文机构及关键词三个方面进行共现聚类分析,形成图谱,从而了解目前国内外反贫困在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前沿方面的相同点及差异之处,对反贫困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2 国内外反贫困研究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2.1 国内外反贫困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

2.1.1 发文量分析

中外文在该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有所不同,图1为中外文近21年发文数量变化。从发文数量趋势来看,中文反贫困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总体上呈现锯齿状,根据发文量在年度上的分布状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0—2008年),发文数量逐年递增,并且2001年发文数量最少,为31篇,2008年发文数量达到最高点,为137篇;第二阶段(2009—2015年)发文数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9年发文数量最多(107篇),2015年发文数量最少(82篇);第三阶段(2016—2021年),该阶段发文数量呈现先递增到最大值然后递减的趋势,其中,2016—2017年,发文数量增幅最大,2019年发文数量最多,达到173篇,发文数量递减的情况可能与中国在2020年完成全面脱贫有关。相比中文,外文关于反贫困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呈现一种曲线递增的趋势,发文量于2021年达到最大值,最大为375篇,在增幅上超越中文发文数量,可以推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反贫困仍会处于热点领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对中外文关于反贫困研究文献发文数量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反贫困主题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属于热点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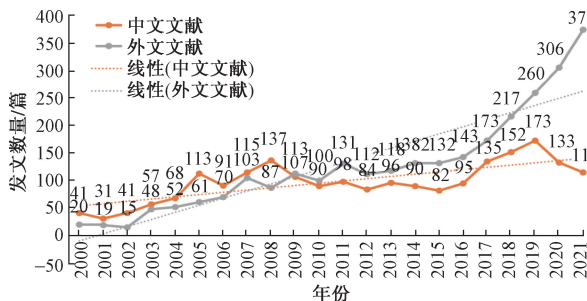


图1 中外文反贫困研究发文数量趋势

2.1.2 作者分析

高产作者在該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根据赖普思定律,可得高产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N_{\min} = 0.749 \sqrt{N_{\max}}$, 其中 $N_{\max}$ 为本领域中发文量的最大值,即某作者的发文量大于(或等于) $N_{\min}$,那么称该作者为高产作者^[3]。中文相关研究者发文量最大值为15篇(不仅仅是一作),根据公式计算得出 $N_{\min} \approx 2.90$,那么发表3篇及以上中文文献的作者被称为高产作者;外文相关研究者发文量最大值为17篇,根据公式计算出 $N_{\min} \approx 3.088$,那么在外文中,发表4篇及以上文章的作者,被认为是高产作者。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得到的作者进行分析,发现中文文献中有41位作者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为高产作者;外文文献中有168位作者为高产作者。

在中文相关研究者中(表2),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汪三贵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左停以15篇的发文量并列第一,左停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反贫困、精准扶贫、相对贫困等方面的问题^[4-6],汪三贵发表的论文重点主要放在反贫困、扶贫政策、贫困原因分析等^[7-9];其次是来自山东大学的解垚发表论文的数量为13篇,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贫困、公共转移支付及贫困影响因素等^[10-12];第三名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其发文数量为11篇,其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涉及贫困、性别视角与民族地区等^[13-14]。外文相关研究作者中发文量居于前三的是 Shackleton CM(17篇)、Shuai CM(12篇)、Lin(11篇)(表3),发表的期刊论文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修复扶贫、太阳能光伏扶贫及项目扶贫等^[15-17]。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者在研究问题上存在不同的侧重点。

表2 中文反贫困研究发文部分高产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1	汪三贵	15	16	王志章	5
2	左停	15	17	张全红	5
3	解垚	13	18	陈银娥	5
4	李小云	11	19	王晓毅	5
5	方迎风	9	20	唐丽霞	5
6	张建华	7	21	王学真	5
7	庄天慧	7	22	曾维忠	5
8	李迎生	6	23	叶普万	5
9	关信平	6	24	丁文广	5
10	郭佩霞	6	25	公茂刚	5
11	郭劲光	6	26	曾小溪	5
12	王大超	6	27	蓝红星	5
13	王曙光	5	28	李实	4
14	徐富明	5	29	施国庆	4
15	向德平	5	30	靳乐山	4

表 3 外文反贫困研究部分高产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1	Shackleton C M	17	16	Ahmed S	7
2	Shuai C M	12	17	Dawson T P	7
3	Li J	11	18	Eigenbrod F	7
4	Liu Y	11	19	Li H	7
5	Hamad R	10	20	Li W J	7
6	Alene A D	9	21	Li Y	7
7	Hussain I	9	22	Maertens M	7
8	Khan M A	9	23	Manyong V	7
9	Liu J	9	24	Otsuka K	7
10	Wang J	9	25	Qaim M	7
11	Abdoulaye T	8	26	Shuai J	7
12	Hanjra M A	8	27	Wang P	7
13	Patenaude G	8	28	Wang Y H	7
14	Schrekenberg K	8	29	Zhang L	7
15	Zhang Y Q	8	30	Ahmed A	6

通过数据分析并进行整理可得中外文作者聚类共现图(图 2 和图 3),在图谱中,作者名字的大小与其发文量成正比,作者之间的连线表示着作者之间曾经有过合作。在图 2 和图 3 左上角的注释中可以得知:中文相关研究作者聚类共现图共有 675 个节点和 188 条连线,密度为 0.000 8;图 3 中共有 733 个节点和 519 条连线,密度为 0.001 9。因此,可以直接得到:第一,中文相关研究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少,仅为外文相关研究作者之间连线的 36%;第二,中文作者合作关系网不仅在数量上较外文少,仅有 7 个,而且中文作者合作关系网中的节点也较外文少,合作关系网中最多的仅有 7 位作者,更多的是以两位作者之间的合作为主,外文作者合作关系网中

最多的有 11 位作者,列出前三名合作关系网中,作者人数均在 5 人以上。这说明在反贫困的研究领域中,中文作者间相较于外文作者缺乏交流与合作。

2.1.3 机构分析

对中外文献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节点类型设置为发文机构,得到中外文献研究机构的共现聚类图谱如图 4 和图 5 所示。其中,机构名称字号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若某一机构名称字号较大,则代表这个研究机构在该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间接显示这一机构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较高的研究水平。

由图 4 和图 5 所示,中文文献研究机构和外文文献研究机构在合作关系网方面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在中文文献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谱中,共有 573 个节点,即有 126 家发文机构,但是机构与机构之间合作不紧密,这表明中文研究机构之间较为独立;在外文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谱中,共有 674 个节点和 664 条连线,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该领域中外都具有有一些超高产机构,但是外文发文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合作关系、机构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外文文献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并对研究机构的名称进行修改(将研究机构的曾用名和现用名统一修改为机构一级现用名称),可以得到中外文反贫困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表 4)。同理,使用赖普思定律计算中外文文献反贫困研究的高产机构。中文发文机构发文



图 2 中文相关研究作者聚类共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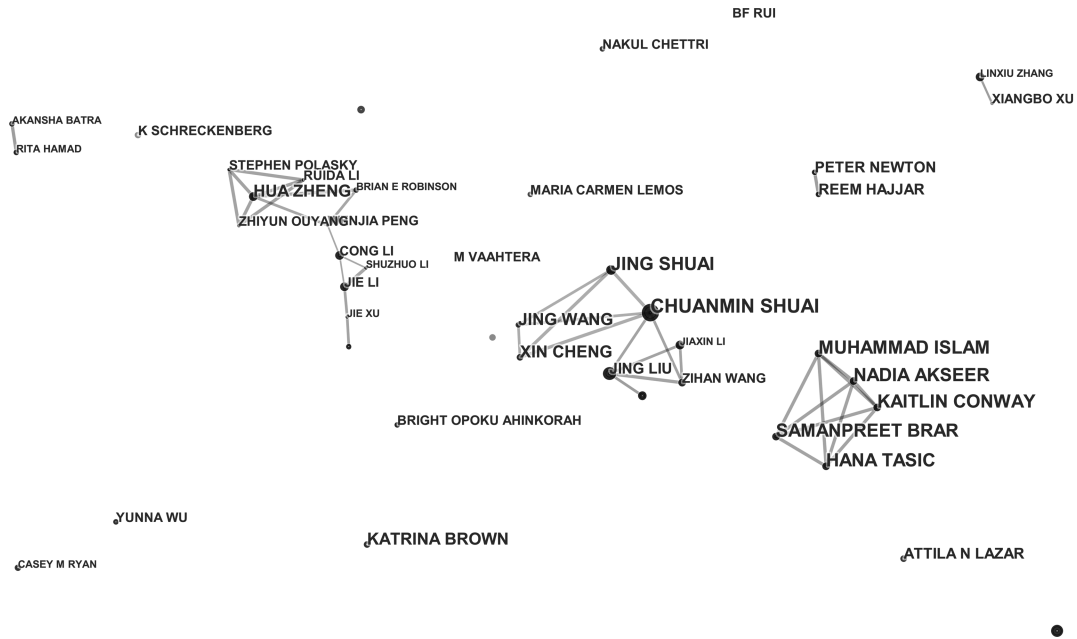


图 3 外文相关研究作者聚类共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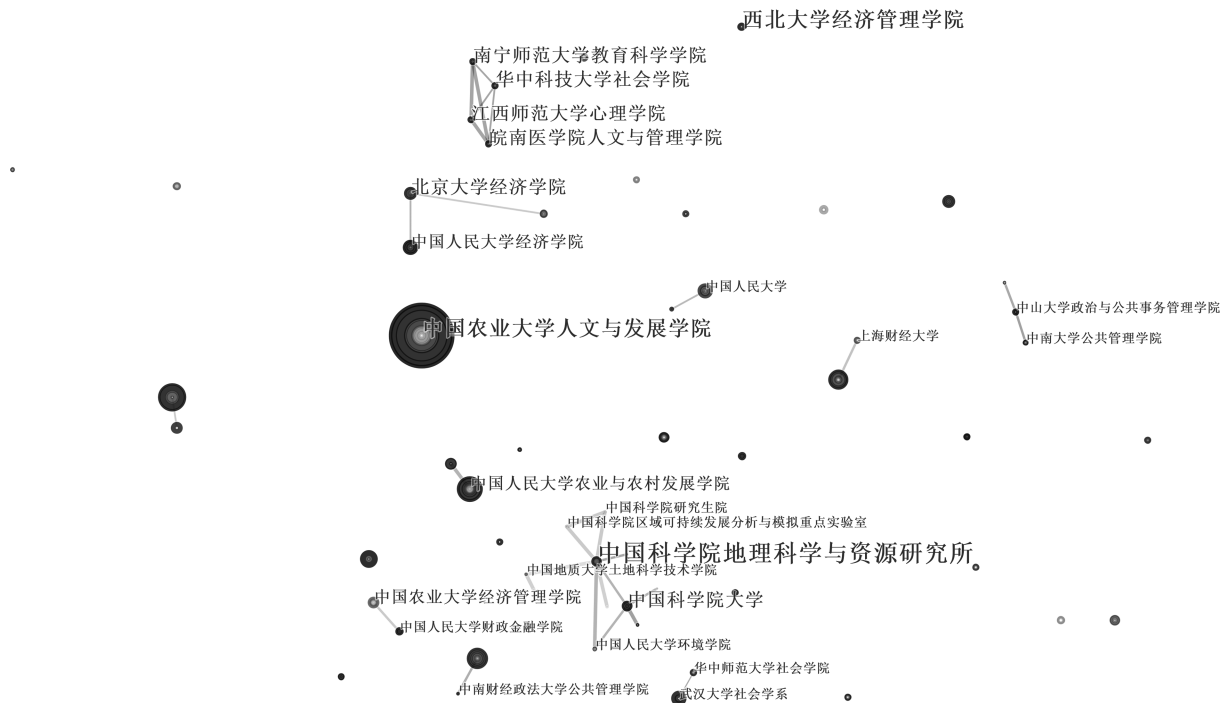


图 4 中文文献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

量最多达到 101 篇,可得 $N_{\min} \approx 7.527$,即发文量达到 8 篇及以上的机构被称为高产机构;外文发文机构发文量最多达到 143 篇,得到 $N_{\min} \approx 8.957$,即发文量达到 9 篇及以上的机构被称为高产机构。基于发文频次,中文研究机构发文频次排名前五的是中国人民大学(101 篇)、武汉大学(65 篇)、中国农业大学

(64 篇)、北京大学(56 篇)、四川大学(47 篇);外文研究机构排名前五的是 Chinese Acad Sci(143 篇)、World Bank(40 篇)、Int Food Policy Res Inst(39 篇)、Univ Oxford(35 篇)、Columbia Univ(22 篇)。其中,外文研究机构在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是 Chinese Acad Sci,共计 143 篇;中国科学院中文反贫困研究的



图 5 外文文献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

表 4 中外文反贫困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机构

序号	发文机构	发文量/ 篇	发文机构	发文量/ 篇
1	中国人民大学	101	Chinese Acad Sci	143
2	武汉大学	65	World Bank	40
3	中国农业大学	64	Int Food Policy Res Inst	39
4	北京大学	56	Univ Oxford	35
5	四川大学	47	Univ Cape Town	29
6	西南财经大学	36	Wageningen Univ	27
7	北京师范大学	33	Michigan State Univ	26
8	西南大学	33	Stockholm Univ	23
9	华中师范大学	31	Univ Edinburgh	23
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8	Columbia Univ	22

发文量达到 17 篇,超过高产机构标准的 8 篇,其在中文发文机构中也处于高产机构行列。

2.2 中外文文献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中外文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做了处理,分别得到对应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6 和图 7)。其中,中文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图谱中有 967 个节点和 1 051 条连线,关键词图谱密度为

0.002 3;外文关键词图谱中有 628 个节点和 103 2 条连线,关键词图谱密度为 0.005 2。

在图 6 和图 7 中,节点表示着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文研究文献关键词图谱中节点最大的是“反贫困”一词,出现次数为 496 次;在外文文献研究关键词图谱中节点最大的是“poverty”一词,出现频次为 427 次。为了更加方便和直观的研究国内外反贫困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关键问题,根据 CiteSpace 软件中导出的关键词信息,按照出现频次从高到低对其进行排序并选取排名前 10 的词,可以得到中外反贫困研究关键词统计。

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看,在国内外反贫困研究文献关键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分别是“反贫困”和“poverty”,检索路径的选择对这种结果的出现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除了路径选择影响,中文研究文献中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分别是精准扶贫和民族地区;外文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分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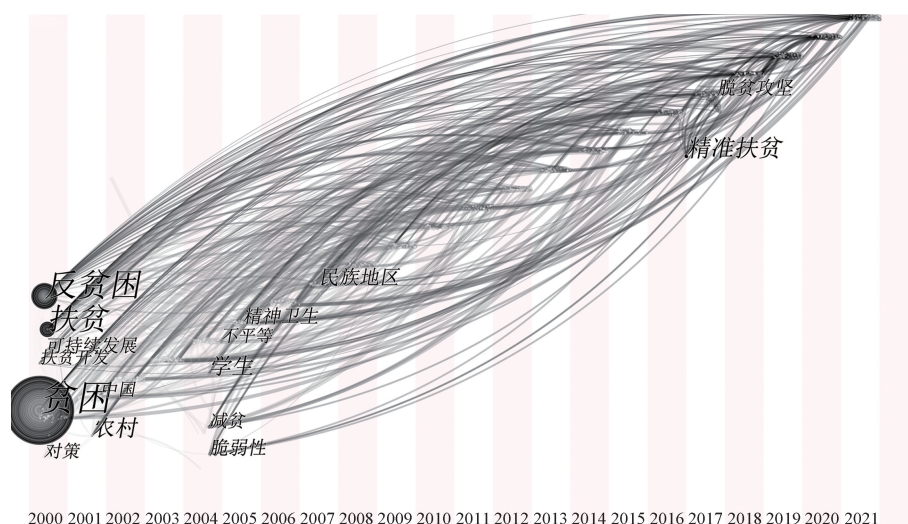


图 8 中文相关研究的时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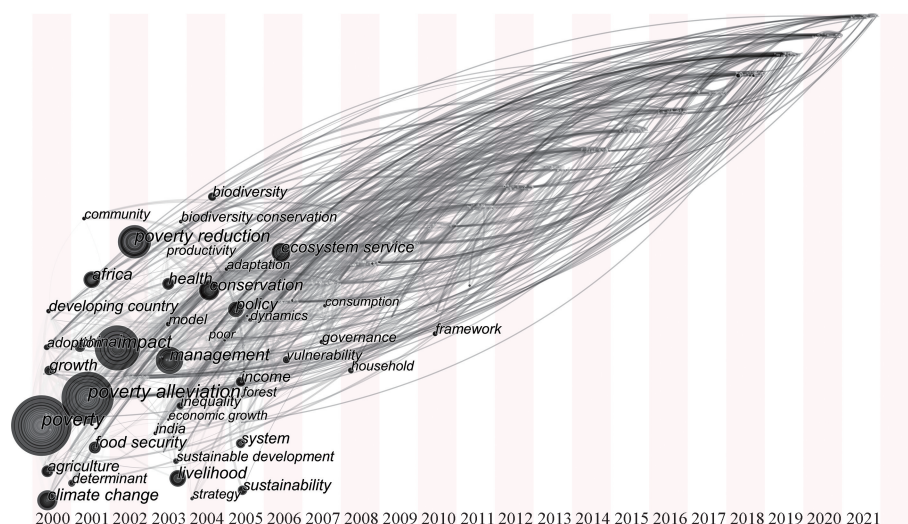


图 9 外文相关研究的时区分析

和图 9 中所示的每个圆点代表的是关键词,圆点所在的位置代表的是关键词所在文章最早的发布年份,圆点的大小与研究热度成正比,圆点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共现关系,连线的趋势代表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发展方向。

由图 8 可知,2000 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反贫困、扶贫开发、可持续发展等,其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反贫困、城市反贫困、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在 2000—2014 年这段时间内,国内学者对反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粗放式的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救助、社会帮扶等,但是这种救助缺乏针对性,致使很多处于绝对贫困家庭的问题难以解决。2016 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精准扶贫、生态补偿等,与党的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紧密相关。2021 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已全面完

成,教育扶贫、后扶贫时代、政策变迁等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并且注重脱贫攻坚政策与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结合图 10 可以预测,乡村振兴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国内反贫困研究领域的热点。

由图 9 可知,外文反贫困研究在 2000—2013 年这一阶段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 poverty(贫困, 427 次)、impact(影响, 323)、disease(疾病, 18)、China(中国, 114)、Africa(非洲, 161)、health(健康, 137)、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 4)、livelihood(生计, 188)、conservation(保护, 189)、food(食品, 24)等,说明外文反贫困研究者在该阶段研究主要从个人的角度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在 2014—2020 年这个阶段,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 migration(移民, 34 次)、ur-



蓝绿色代表没有出现年份,红色代表出现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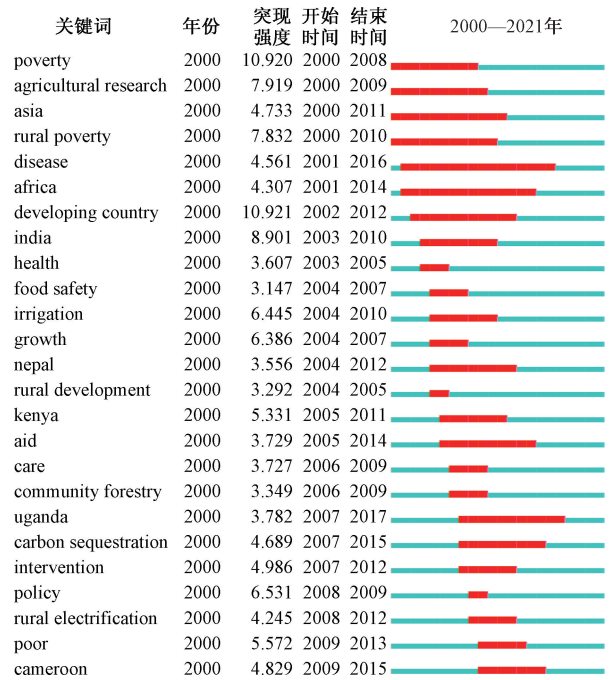
图10 中文反贫困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

banization(城市化,20)、performance(表现,35)、renewable energy(可再生能源,26)、multidimensional poverty(多维贫困,22)、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24),这表明外文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结合图11可以预测,社会政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将会成为国外反贫困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2.3.2 阶段划分

为了可以清晰地展示国内外不同阶段的热点和研究趋势,接下来对时区进行划分。根据中文反贫困的发展形势,文献数量以及关键词的类别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0—2011年):参与式扶贫阶段。这一阶段延续了前期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在此基础上(2007年以后)国内反贫困开始进入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的新阶段^[18]。该阶段出现较高频次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民族地区(45次)、脆弱性(32)、可持续发展(30)、社会保障(23)、扶贫开发(22)、不平等(22)、社会救助



红色代表出现年份,蓝绿色代表没有出现年份

图11 外文反贫困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

(20)、小额信贷(18)等。这一阶段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标志。任新华^[19]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分析了反贫困战略在石柱县的实践以及其启示。陈静^[20]总结了我国不同阶段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并指出我国已经找到了一条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正确途径。赵茂林^[21]通过对中国西部农村贫困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分析,认为教育对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乐章^[22]通过对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证分析,分析了农村扶贫的可行性以及其具体措施。这一阶段,国内将反贫困的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农村和民族地区;并且在这一阶段,国内采取的扶贫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过去的以“输血机制”“造血机制”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转变到以“活血机制”为主体的反贫困综合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国内反贫困工作由贫困地区的经济目标向综合发展目标要求的转变。

第二个阶段(2012—2020年):精准扶贫阶段。由图10可以看到,该时期也是关于反贫困研究发文数量增加时期。该阶段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精准扶贫(97次)、脱贫攻坚(35)、乡村振兴(14)、习近平(12)、精准脱贫(10)、贫困治理(10),研究重点从上一阶段的两轮驱动反贫困到现阶段的精准扶贫研究阶段。随着两轮驱动反贫困方案的实施,我

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功。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23]。沈万根和马骥群^[24]以十八洞村为例分析了精准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及其启示。杨增崇和张琦概括了精准扶贫所包含的理念,分析了精准扶贫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25]。汪三贵和刘未^[26]等认为“六个精准”为精准扶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扶贫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措施、也是具体扶贫实践中的有力抓手。雷焕贵^[27]基于“五个一批”与“五大振兴”,探索了如何从脱贫攻坚过渡到乡村振兴,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党中央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实践路径,明确各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决绝对贫困的任务。随之,反贫困制度安排自上到下,迅速投入实践。同时随着反贫困的不断深入、绝对贫困的消失,我国反贫困逐渐进入到新时代、后扶贫时代的研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思路。

外文研究(图11)第一阶段(2000—2014年):该阶段的外文研究主要是从个体、发展中国家以及生态等方面进行反贫困研究。poverty(贫困,427次)、poverty alleviation(缓贫,391)、conservation(保护,189)、China(中国,114)、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110)、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170)、food security(食品安全,135)等是此时期的研究热点。例如,Ellis^[28]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进行研究,对家庭采取多种生计策略的原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农村生存不稳定条件下,多样化对生计安全的积极作用超过其负面作用。Ozer等^[29]通过对墨西哥大规模反贫困计划对产妇抑郁症状影响的评估,强调了个体的福祉对宏观经济政策和计划有影响。Fisher等^[30]在文中提出了生态服务系统服务和减贫(ESPA)概念框架,这具有作为多学科、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研究作用,也有应用支持从业者追求环境可持续性和减轻贫困的联合政策目标。Griggs等^[31]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制定了目标和相关目标的综合框架,这表明制定与粮食、能源、水和生态服务系统服务目标相关的综合目标是可能和必要的;从而提供中立的循证方法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讨论。

第二阶段(2015—2021年):这一阶段外文关于

反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展开。该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24次)、renewable energy(可再生能源,26)、urbanization(城市化,20)。例如,Cervantes-Zapana等^[32]通过对反贫困战略斗争中创新项目家庭农业公共采购的分析,旨在确定与拉丁美洲相关 PP-FF 的经济收益,并根据其相对重要性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Genens^[33]通过对加州农业法律援助(California Rural Legal Aid,CRLA)作为反贫困战争法律服务计划的一部分的研究,阐明了农场工人和农村贫困人口的作用,揭示了反贫困政策在解决农业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农村斗争对反贫困战争命运的重要性。Lo^[34]通过对中国光伏扶贫计划的案例研究,表明了中国的多层次实验方法需要动态机制,不仅能够使国家级模型适应特定地点,而且能够将地方实施经验纳入国家政策制定。这一阶段,国外研究者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探讨反贫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揭示了反贫困政策在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方面的有效性与重要性。

3 国内外反贫困研究的差异性比较

从国内外反贫困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反贫困研究的热度不断提高和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是国内和国外文献关于反贫困研究的共有特点。本节主要对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性进行探讨。

中文文献的研究具有政策性导向,外文文献更多呈现理论发展导向。受经济能力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双重限制,中国在贫困救助初期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救济规模与程度远比发达国家小。为了取得脱贫攻坚的决战性胜利,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由中央牵头,多方参与、多阶段推进脱贫与反贫困工作。2014年1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印发标志着精准扶贫的开始;2015年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明确了扶贫攻坚冲刺期的总任务和总要求。以纳纳·缪尔达尔、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阿玛蒂亚·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反贫困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得一些学者借用这些理论对本国的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在合作关系网络方面,国内机构与机构之间、

学者与学者之间相较于国外在合作与交流方面存在不足。从外文文献分析来看,反贫困研究机构多分布在欧美国家,且大多数为世界名校。国外相关研究机构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较为频繁的学术交流。相关的研究者在较大的范围内合作研究,且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网。从中文文献分析来看,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多集中在一些东部地区的高校,机构与机构之间以及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高产作者较多的是独自研究,没有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网络。

在扶贫方式选择方面,国外研究者倾向于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国内的研究者则对不同的扶贫方式展开研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国外学者更加偏重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缓解贫困状况,如 Martins 和 Shackleton^[35]通过对莫桑比克南部地区部分村庄棕榈树开发情况进行调研,经过对比研究发现经济的增长、商业化程度增加可以缓解该地区贫困。中国之大,致贫因素千差万别,贫困类型不尽相同,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国内研究者因地制宜,对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旅游扶贫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刘锦怡和刘纯阳^[36]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实际减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贫困的缓解;王保英^[37]指出继续教育对提升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加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宁静等^[38]利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difference, DID)模型对乌蒙山以及六盘山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项目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在反贫困研究主题方面,国内学者的反贫困研究历程与我国扶贫政策阶段的划分密切相关,国外学者的反贫困研究与经济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我国扶贫政策的阶段划分引领着国内学者对反贫困的研究,并且我国扶贫目标的维度随着政策的变化而拓宽,与此同时,反贫困政策的变化也受学者们研究结果的影响。国外学者的反贫困研究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展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则不同的国家间具有不同的贫困特点,因此,国外学者不仅关注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贫困现象,也对高收入国家的贫困原因进行了多维分析。

4 结论与建议

以反贫困为研究对象,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选择的 4 933 篇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通过图谱对国内外关于反贫困研究的发文趋势、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热点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从历年发文量的变化(图 1)可知,尽管对反贫困的研究持续了很久,但是当前对反贫困的研究仍然是热点话题。由图 1 可知,中文发文量曲线呈现锯齿状,外文发文量近些年来以凹曲线形状递增,中外文发文量曲线呈现不同形状,可能是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在研究趋势上呈现政策导向和理论导向的差异性导致的。对比图 4 与图 5 可知,外文发文机构之间形成了较多的以大机构为中心的合作关系,相较于外文发文机构,中文发文机构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由图 2 与图 3 对比可知,相较于外文作者的合作团队,中文作者的合作团队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综合机构和高产作者分析发现,中文文献的合作团队在未来应加强机构以及作者之间的合作。

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对反贫困领域的研究热度远大于国外,但在研究层次和研究趋势的把握上和国外相比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体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我国的反贫困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反贫治理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国内的研究热点已经转到乡村振兴及后扶贫时代等。因此,在新的阶段,国内反贫困的研究要结合国外反贫困研究的理论,提高认知深度和理论深度,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寻求其内在机理和联系。这不仅能够为国内接下来的反贫困提供了方向和道路,更有利于与国际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接轨。

1)吸收国外经验,将国外经验本土化。例如,在脱贫地区健全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对脱贫人口按类型进行划分监测其收入变化,以此来探究脱贫人口再返贫的内在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可以有效地避免脱贫人口再返贫。

2)在国家设立的五年过渡期内,脱贫不脱政策,加大过渡期内的帮扶力度,使脱贫地区由精准扶贫顺利过渡到乡村振兴。

3)注重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培养,加大对其基础教育以及技能培训,除此之外重视脱贫人口的心理变化。

4)助力脱贫地区产业振兴,在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来进行产业振兴,加强合作社与脱贫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结,

更加注重合作社对脱贫人员的帮扶与带动作用。

5)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国际性或地区性反贫困的统一战线。贫困是当代国际社会诸多矛盾产生的根源与导火索,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已经达成了消减贫困的强烈共识,但实施反贫困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科学、灵活有效的协作机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吴翔宇,田刚,丁云龙.中外合作社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世界农业,2020(2):105-114.
- [3] 贺雪晴.从川渝地区学术期刊看成渝经济圈建设研究状况——基于CSSCI来源期刊的可视化分析[J].西部学刊,2022(6):25-30.
- [4] 左停,刘文婧.教育与减贫的现实障碍、基本保障与发展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目标下教育扶贫战略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6):85-96.
- [5] 左停,徐卫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3):92-99.
- [6] 左停,徐卫周.从二维并行到一体互嵌:2020年后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的统筹发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2):39-46.
- [7] 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J].农业经济问题,2020(2):4-14.
- [8] 曾小溪,汪三贵.中国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基于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历史考察[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6):11-19.
- [9] 刘明月,冯晓龙,汪三贵.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J].农村经济,2019(3):64-72.
- [10] 解垚,宋颜群.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J].财贸经济,2020,41(2):24-38.
- [11] 苏春红,解垚.财政流动、转移支付及其减贫效率——基于中国农村微观数据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5(4):34-49.
- [12] 解垚.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再分配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8(8):116-131.
- [13] 刘晓昀,李小云,叶敬忠.性别视角下的贫困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13-17.
- [14] 李小云,张瑶.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0(1):5-16.
- [15] LIU W, XU J, LI J, et al. Rural households' poverty and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wester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4).
- [16] McConnachie M M, Cowling R M, Shackleton C M, et al. The challenges of alleviating poverty through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sights from South Africa's "working for water" program[J]. Restoration Ecology, 2013, 21(5): 544-550.
- [17] LIU J, HUANG F B, WANG Z H, et al. What is the anti-poverty effect of solar PV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Energy, 2021, 218.
- [18]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 [19] 任新华.“石柱现象”与中国未来反贫困战略选择[J].农村经济,2000(8):25-27.
- [20] 陈静.我国反贫困战略的两次大调整及其思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S1):72-73.
- [21] 赵茂林.关于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的认识[J].乡镇经济,2006(10):20-23.
- [22] 乐章.反贫困与社会发展: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1):37-41.
-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4-01-26(002).
- [24] 沈万根,马骥群.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J].科学社会主义,2018(2):102-108.
- [25] 杨增崇,张琦.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15.
- [26] 汪三贵,刘未.“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40-43.
- [27] 雷焕贵.中国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索——基于“五个一批”与“五大振兴”衔接的视角[J].财会月刊,2023,44(6):130-136.
- [28] ELLIS F.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 51(2): 289-302.
- [29] OZER E J, FERNALD LC, WEBER A, et al. Does alleviating poverty affect mothers' depressive symptoms? A quasi-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Mexico's opportunities progr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1, 40(6): 1565-1576.
- [30] FISHER J A, PATENAUE G, GIRI K,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Ecosystem Services, 2014: 34-45.
- [31] GRIGGS D, SMITH M S, ROCKSTROM J, et al.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4, 19(4): 49.
- [32] CERVANTES Z M, YAGUE J L, DE NICOLAS V L, et al. Benefits of public procurement from family farming in Latin-American countries: identification and prioritiza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7: 123466.
- [33] GENENS D.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fields: legal services and the war on poverty in rural California[J]. Agricultural History, 2020, 94(2): 251-278.
- [34] LO K, BROTO V C. Co-benefits, contradictions,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low-carbon experimentation: leveraging solar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19, 59: 101993.
- [35] MARTINS A O, SHACKLETON C M. The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palm wine from hyphaene cori-

- cea and phoenix reclinata in Zitundo area, southern Mozambique[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otany, 2018, 116:6-15.
- [36] 刘锦怡,刘纯阳.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 财经论丛, 2020(1):43-53.
- [37] 王保英. 我国继续教育扶贫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 职教论坛, 2021, 37(7): 133-140.
- [38]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等.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4):58-66.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Anti-povert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NIU Ben, LU Qian, ZONG Xuelin

(Business College,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anti-poverty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a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taking 4 763 anti-poverty research documents collected in China HowNet and WOS database in recent 21 year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distribution, high-output research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 are as follows. Domestic anti-poverty research literature is less than that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recognition among domestic scholars is low, and the academic cooperation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loose.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Chinese researchers us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ake a poverty-stricke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 its anti-poverty measures pertinently, but seldom explore the universal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anti-poverty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mphas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research trend, Chinese literature is mostly policy-oriented, while foreign literature is more oriented towards theoretical output.

Keywords: anti-poverty;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research hotspot; research trend